

• 科学技术文化研究 •

## “心”“脑”之辨的当代认知价值

### The Contemporary Cognitive Value of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Heart” and “Brain”

王前 / WANG Qian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辽宁大连, 116024)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摘要:**“心”“脑”这两个概念混用,源于近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用中国文化术语译介西方脑科学知识的特定表达方式,而后逐渐成为民众思维活动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其后果是容易造成人们“用心”思维能力弱化,很多应该“用心”解决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当代全球化趋势和人工智能广泛使用给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彰显了“用心”思维作为不可替代的人类智能的特定价值。有必要从认知科学和哲学视角仔细辨析“心”“脑”之间的本质差异和联系,分析“心”“脑”概念混淆的缘由及影响,建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心”“脑”协同关系,使中国传统的“心”的智慧转化为当代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关键词:**“心”“脑”之辨 全球化 人工智能 认知价值

**Abstract:** The mixed use of the two concepts of “heart” and “brain” originated from the specific expression of western brain science translated by the use of Chinese cultural term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since modern times, and then gradually beca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people’s thinking activities.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it is easy to cause the weakening of people’s ability to think by heart, and many social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solved by heart could not be dealt with in time.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widespread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brought profound impact on social life, demonstrating the special value of “thinking by heart” as an irreplaceable human intelligence. It is necessary to carefully exam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the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between “heart” and “brain”, analyzing the cause of the mixed use of the two concepts and its influence, and constructing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rt” and “brain”. This will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making the wisdom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ear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culture, and providing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Heart” and “Brain”; Globaliz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gnitive value

中图分类号: B842.1: TP1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3.04.012

“心”“脑”这两个概念混用,是我国学术研究和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尽管作为一种科学常识,现在人们都知道大脑是思维器官,但彼此交谈中仍有大量涉及“心”的提

法,如“用心学习”“心想事成”“不忘初心”等,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也有“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之类表述。如果仔细琢磨,可以发现中国人讲的“用心”与通常所说的“动脑”并非一

收稿日期: 2022年1月11日

作者简介: 王前(1950-)男,辽宁沈阳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和机体哲学。  
Email: qianwang@dlut.edu.cn

回事,而是有特定含义。不能把涉及“心”的表述替换成“脑”,比如不能将“贴心”说成“贴脑”,把“中国心”说成“中国脑”,把“心心相印”说成“脑脑相印”。然而在相当多的场合,人们感受不到“心”“脑”概念之间有什么明显差异,提到“用心”自然想到“动脑”,而专心致志“动脑”则被当作“用心”。这种概念混淆看起来问题不大,实际上会造成一些人“用心”思维能力不断弱化,很多应该“用心”解决的社会矛盾未能及时处理。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和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替代人类智能的时代背景下,“用心”的特定认知价值逐渐突显出来。这本来是其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可能由于缺乏足够反思而被忽略。因此,从哲学和认知科学视角开展“心”“脑”之辨的研究,将“用心”与“动脑”明确区分并建构其合理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紧迫的现实意义。

## 一、认知视角的“心”“脑”概念辨析

从认知角度看,“心”与“脑”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在西方近代脑科学知识传入我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回答。因为中医和西医对“心”与“脑”的理解本来就有很大差异,中医所说的“心”是人体中具有思维功能的器官的总称,包括“脑”在内,现代中医仍持同样看法。<sup>①[1]</sup>普通民众谈到“用心”,指的是一种思维习惯和心理态度,一般不会同脑科学知识对立起来。学者们从哲学和文化角度理解“心”“脑”概念时又增添了许多复杂因素,当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心”“脑”概念比较。这个问题在现代脑科学发展起来之后才有希望得到解决。

自20世纪60年代罗杰·斯佩利(Roger Sperry)等人著名的“裂脑实验”之后,关于大脑不同区域功能定位的研究迅速发展。<sup>[2]</sup>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的大脑由左、右两个半球(也称左、右脑)组成,左脑主要掌管逻辑

推理、数学运算、语言表达,而右脑主要掌管形象思维、想象、直觉、创造等活动。除了左、右脑,大脑的边缘系统也会影响人的认知活动。边缘系统是大脑皮层周边部位及皮层覆盖的一系列互相连接的神经核团的总称,其功能涉及内脏活动、躯体活动、内分泌、情感等复杂过程,是整合人的全身体验特别是内脏体验信息并汇入大脑的关键器官,也被称为“内脏脑”。<sup>[3]</sup>大脑在认知活动中需要整合左、右脑和边缘系统的功能共同发挥作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动脑”,强调运用一定思维规则去思索和推理,实际上指以左脑为主导的思维类型(右脑和边缘系统起辅助和协调作用),因为自觉的理性思维和规则意识主要凸现左脑的功能。而“用心”实际上指由右脑和边缘系统为主导的思维类型(左脑起辅助和协调作用),因为“用心”的特征在于注重整体把握、直观体验和灵活变通,凡是中国人日常语境中讲“用心”的地方涉及的都是这一类思维活动。中国古人之所以将“心”视为思维器官,是因为心脏状态对这类思维活动的影响比其他脏器更显著,其病变会直接影响思维过程。在现代的脑科学知识没出现之前,从直观体验出发,提出“心之官则思”的主张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中医是将“心”“脑”视为一体的,两者功能有别,但无明确界限。

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心”的理解超出了生理层面,只针对“心”的思维功能。孟子引孔子的话说:“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详,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这操舍存亡之心显然并非指心脏。王阳明也曾明确指出:“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张岱年先生总结了先秦至清代有关“心”的种种观点,包括“心”具有认识功能、具有道德意识的意义、具有裁制情欲和主宰行动的作用、是人的主体性之所在、心即理、心能辨理等。<sup>[4]</sup>这里的“心”都是指人的内在认识能力(中国传统的“心”很难在西方语言中找到

①现代中医的解释是:“心,五脏之一,与小肠相表里。主神明,是精神、意识、思维等高级中枢神经活动的主宰,对其他脏腑的功能活动起领导作用。”

完全准确的对应词，如果用“Heart”表示其区别于生理意义上“heart”的特定含义，可能是英语世界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心”还被赋予价值观、伦理学和美学方面的意义。古人认为人有人心，天有天心。圣人能够体悟天心而感化人心，执中含和，才能使天下太平。宋代张载强调“为天地立心”，认为“心”是理解和协调天地万物关系的基础。<sup>[5]</sup>中国古代对“心”的理解逐渐发展成为陆王“心学”，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独树一帜的。<sup>①[6]</sup>“用心”思维注重知情意相结合、真善美相统一，有助于创造性的发挥，有效促进社会生活各方面关系的和谐。尽管中国古代逻辑思维并不发达，但生产技术却相当发达，取得了很多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发明创造。<sup>[7]</sup>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身心关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心”的思维功能有关。相比较而言，西方思想史上对“脑”的理解并没有超出生理层面，“脑”只是人类意识活动的载体，“脑”的生理和病理变化会影响但并不等同于人的意识活动。西方学术界并未出现“脑学”这样的学问（有的只是“脑科学”），“动脑”本身也不具有价值观、伦理学、美学等方面的意义。

因此，从哲学和认知科学角度看，“心”与“脑”代表中国和西方对人的认知器官及其功能的不同理解，对应于由大脑不同部位主导的不同思维类型，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这是“心”“脑”概念在实际语境中不能随意相互替换的根本原因。“用心”和“动脑”各有其优势和不足。“用心”的直观体验特征具有不够严格、精确、细致的弱点，但其注重整体性、体验性和事物之间有机联系的优点是“动脑”思维所缺乏的。而“动脑”的弱点与优点恰好与“用心”相反。当这两种思维类型相遇共处时，若能明确界定各自适用范围，取长补短，相互配合，显然会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可是如果不能自觉协调两者关系，就会发生超越各自适用范

围而彼此替代的状况，影响其作用的正常发挥。“心”“脑”概念混淆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思想根源，这种状况反过来也会带来“心”“脑”概念混淆的进一步加重。

## 二、“心”“脑”概念混淆的缘由与影响

“心”“脑”概念混淆是“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定产物。“动脑”思维是伴随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传人才逐渐为人们熟悉的。在这一过程中，面临如何消除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理解障碍的问题，一些学者就将涉及“动脑”的相关知识翻译成便于从“用心”角度理解的表达。一个突出例子是对西方哲学中“唯心论”的翻译。这个词本身是外来词，日本学者先是将“idealism”（观念论、理念论）译成“唯心论”，然后再传入我国。<sup>[8]</sup>这种译法开启了将“心”“脑”概念混用的先河。与此类似，英语中的“mind”被译成“心”或“心智”，“mind-body relation”（精神与肉体关系）被译成“心身关系”，“psychology”（研究人们感觉、知觉、思维、情感规律的科学）被译成“心理学”。实际上这些术语都来自“动脑”的思维活动，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用心”没什么关系。<sup>[9]</sup>不过，这些译法尽管不精确，但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因为一谈到“心”，人们马上会联想到精神活动，因而西方有关精神、观念、认知等方面的学术成果很容易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中。

在“心”和“脑”这两个概念通过翻译渠道建立这种不严格的对应关系之后，很多人就不去思考“心”与“脑”的差异与不可互换性，而是追求这两个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灵活变通的自洽应用。在学术研究层面，中国哲学史研究和西方哲学史研究的不同范式可以相安无事。如果在中国哲学史的范围讨论“用心”，学者们依旧按照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路来解读“心”，谈论“心之官则思”“心包万物”“心学”等话题，但不会同时考虑西方学者如何理解“心

①世界上有些古老民族也曾流行过“心”能思维类似观念，但从未出现过“心学”这样系统的学说。

身关系”。一些对中国哲学有兴趣的西方哲学家和汉学家也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解讨论“心”的功能和价值,并将其等同于意识活动。瑞士汉学家耿宁所著《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一书,从现象学角度分析中国传统心学的一些思想成果,但并没有从“心”与“脑”的差异角度展开考察。<sup>[10]</sup>安乐哲曾指出:“‘心’常常被译为‘mind’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仅仅将其译成‘heart’是不充分的,……如果不是这个‘心’在思考的话,中国古典著作中的许多篇章都是不可理解的。”<sup>[11]</sup>然而他并没有进一步指出“心”与“mind”之间是否还存在什么本质区别。可是如果到了西方哲学或现代哲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就换了一个思路,从汉英语言互译角度将“心”直接对应于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活动、知觉活动、思维过程,谈论唯心论、心身问题、心理学,但不会在意中国传统哲学对“心”的本意的理解。如果有人要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心”是否存在区别于“脑”的根本特征,则很容易被认为小题大做,得不到响应。“心”“脑”混用的思维惯性相当大,以至于很多人见到“用心”马上会想到“动脑”,觉得讨论二者区别根本没必要。

在日常生活层面,普通民众已经习惯于既讲“动脑”也讲“用心”,但将其分别置于不同语境下使用,而且同样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当涉及学习专业科技知识、执行规章制度的时候,人们习惯于讲“开动脑筋”。这时若提到“用心”,仅指一种认真的学习和工作态度。而当涉及人际交往和承担社会角色责任的时候,人们习惯于讲“真心诚意”。这时若提到“动脑”,仅指一些具体操作方法。这种灵活变通的处理方式一方面有益于传统的“用心”思维继续发挥作用,便于“心”与“脑”思维功能相互补充,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从认知角度进行“心”“脑”之辨的必要性,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相比较而言,传统的“用心”往往是不自觉的,缺少反思的。现代中国人尽管都能领会“用心”的意思,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究竟什么是“用心”;人们都强调“用心”很重要,却难以说清楚为什么要“用心”;人们经常给自己或他人提

出要“用心”的要求,却难以说清楚应该怎样“用心”。“心”“脑”概念混淆使得人们将“动脑”视为“用心”框架下的一种特定方式,而“用心”则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sup>[12]</sup>即使人们“用心”的能力在弱化也难以察觉。不少人很难说清楚在思考某个问题时自己究竟是在“动脑”还是在“用心”,而且会觉得这样提问题莫名其妙。

“心”“脑”概念的混淆造成“动脑”实际上会不断替代(或“架空”)“用心”,这种趋势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加速逐渐显现出来。尽管“用心”思维仍然在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教育、协调社会关系以至创造性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一些涉及社会整体利益的事情上产生过显著效果,但“动脑”思维的作用总体来说越来越强劲,作用范围越来越大。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发挥“动脑”思维的作用在科技、生产、经贸、法治、管理等领域非常必要,能够有效弥补历史上单靠“用心”思维带来的局限性。可是在一些应该需要“用心”解决的社会问题上也简单采用“动脑”的思路和方法,就会出现片面、生硬、狭隘的倾向,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近年来人们关注的一些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不同程度上与“动脑”对“用心”的过度替代有关,也反映出一些人“用心”思维能力实际上不断弱化。这方面问题在教育和管理领域尤为突出。

在教育领域,近年来人们很关注有些学生“智商”高而“情商”低,遇到挫折就容易方寸大乱甚至轻生的问题。不少老师和家长意识到有些学生不会发自内心去关心他人,不会将心比心,在面对责任心问题时往往想通过“动脑”给自己找辩解理由。尽管多年来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强调要“入脑入心”,但“不用心”“不走心”“不上心”的事情还在不断出现。以往人们常将其归结为家庭宠爱过度、过于看重学习成绩、缺乏心理辅导,很少意识到这些学生“用心”能力实际上在下降,而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学校里学到的书本知识主要来自“动脑”思维的成果,因而学生们容易注重接受“动脑”的知识而忽视“用心”的能力,注

重专业知识考核而忽视人文素养的熏陶。靠“动脑”获得的书本知识要转化成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需要经历一个“用心”体验和深化的过程,否则会出现“高分低能、创新乏力”的现象。而从课堂上学来的伦理知识,更需要通过“用心”转化成“良知”,培养相应的道德情感,才能够落实在道德行为上。学生“用心”能力下降带来的这些问题不容忽视。

在管理领域,近年来人们很关注管理措施如何落实“以人为本”的问题。由于具有“动脑”特征的工具理性伴随人工智能技术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出现了人才评价中过度依赖量化指标、管理活动中简单照搬规章条文、对主动性和大局意识关注不够的倾向,造成一些行政管理人员缺乏人际沟通和协调能力。有些管理措施在局部看来合理,但整体上缺乏人文关怀,往往是因为管理者不“用心”,发现不了其中的问题,因而才造成一些本该“用心”解决的社会矛盾未能及时处理。单纯强调“动脑”,只关注局部的、可量化的、显性的收益,容易忽视全局性的、需要体验的、隐形的危机因素和应对措施,造成人与物、自然与社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全球化时代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金融危机等重大现实问题,都是从局部地区向全球范围,由隐形向显性,由确定向不确定逐渐蔓延的。“用心”思维本来应该在应对这些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用心”能力的削弱会使这些问题的治理难以取得预期成效。

“用心”思维能力实际上不断弱化,还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极端化事件上。前些年媒体披露过某些行政部门设置过低的办事窗口、有的学校为防止学生违纪到操场上考试,以及新近出现的某社区事务中心要求办理残疾证必须“植物人”本人到场<sup>[13]</sup>之类“奇葩”事件,显然是社会治理方式上根本不“用心”的表现。网络信息传播带来了“思维碎片化”倾向,使得一些人的思维出现“短路”,出现了在公交车上抢方向盘、在高铁上“霸座”、走路只顾看手机丢了孩子等极端化行为,而这种事情的

出现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这也表明一些人“用心”能力的弱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动脑”思维之所以能不断替代或“架空”传统的“用心”思维作用,与“用心”和“动脑”各自的思维特征都有关。“用心”思维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够将“动脑”思维融入自身框架中加以理解,但其独有的特征和价值以往却没有充分体现出来。“用心”本身没有硬性要求。当人们发现某些人办事不用心、某些孩子学习不用心的时候,习惯的做法只是批评、督促、感化,很少提出具体的标准。从外部环境看,自古以来培育“用心”思维需要耳濡目染的氛围,但这种氛围现在由于“用心”与“动脑”并存已不复存在。“用心”能力的提升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宣传,而这种事情在人们忙于从事与“动脑”相关的工作时可能无暇顾及。从内部因素看,“用心”的整体性要求与“动脑”的分析性要求相矛盾,“用心”的知情意相贯通特征与“动脑”的客观、冷静、有条理的要求相矛盾,“用心”思维强调定性与“动脑”注重量化相矛盾。当“动脑”的能力在教育、管理、评价活动中不断强化的时候,“用心”的能力自然会无形之中逐渐被弱化。人们以往对“用心”的理解、价值判断和方法体验,也会逐渐被“动脑”的知识、认知机制和思维方法取代。

### 三、协调“心”“脑”关系的当代途径和意义

要解决“心”“脑”概念的混淆带来的问题,协调好二者关系,仅靠呼吁人们重视“用心”的作用是不够的。关键是转变人们的观念,重新认识“用心”思维的本质特征,使之从传统的思维习惯转化为具有现代科学根据和认知价值的思想资源,使“心”“脑”关系的协调成为现代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需要从现代哲学和认知科学出发,进一步探讨“用心”思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而建立“心”“脑”之间合理的协同作用机制。

建构“用心”思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需要综合考虑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积累和现代哲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心性”特征和“用心”过程的论述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整理,但其中包含一些揭示直观体验认知机制的特定概念和方法,具有重要价值,与现代西方的现象学、解释学、隐喻理论和认知哲学研究相关成果也有相通之处。<sup>[14]</sup>“用心”的认知对象是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象”,它是对事物进行整体性的直观体验的认知结果。“象”可以划分成由具体到抽象的不同层次,如“物态之象”“属性之象”“本原之象”“规律之象”,大体上相当于西方现象学讲的“生活直观”“范畴直观”“本质直观”。“用心”思维的过程包括取象比类、立象尽意、得意忘象诸环节,形成了格物致知的完整链条,这是西方哲学对想象、直觉、意会知识的研究中较少涉及的。西方解释学、现象学、隐喻理论的相关研究在精细辨别直观体验过程的细节特征方面更具优势,但缺乏“用心”思维对直观体验思维整体性、融贯性、致用性理解的独特理论视角和文化积淀。当代认知哲学有关“涉身认知”的研究,关注的就是大脑边缘系统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但由于西方哲学框架里原本就没有中国人所说的“心”的位置,只能将“脑”的认知功能和身体的体验功能融为一体加以考察。<sup>[15]</sup>还应看到,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中都有对右脑和边缘系统作用的不同理解,但它们并不具备“用心”思维知情意相贯通、真善美相统一的特点,也没有提出诸如“道法自然”“和而不同”“知行合一”这样的深刻理念,因而在影响社会生活方面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局限性。由此可见,“用心”并不只是现代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历史文化遗产,它有着特定的认知价值和优势,因而能够在解决当代整体性、全局性、体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个人的全面发展。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已经显现出整体性、全局性、体验性思维对解决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工程风险、经济秩序等全球性问题

的重要意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上是在“动脑”思维推动下展开的,工具理性、规则意识和分析精神带来了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急剧变化,但到了20世纪逐渐开始出现“临界效应”,<sup>[16]</sup>即接近全球环境和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可以承载的边界,需要及时做出调整,此时“用心”思维可能重新显露出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价值。当代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变化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人工智能目前看来主要是“动脑”思维的人工化,无法取代“用心”的作用。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就曾指出计算机是最好的左脑,认为其优势在于逻辑与推理,但从未发展出右脑能力。<sup>[17]</sup>随着依靠“动脑”的实践活动越来越被人工智能取代,“用心”思维能力的重要性会日益凸显。人工智能不会自己主动去想象和创造,不会出现直觉和灵感,更不会自己产生“良心”。判断人工智能存在的“图灵测试”和塞尔的“中文屋”试验,都是针对语言交流的,那是“动脑”的能力。<sup>[18]</sup>至于人际交流中“心领神会”的部分,则是人工智能无法模拟的。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模拟人类的情感、意向、决策过程,但无法完全模拟和替代“用心”思维调动人的全身心体验和利用人类社会长期文化积淀的能力,这一点在战略决策方面体现得更加明显。单独依靠数据和算法,人工智能无法把握只有人类整体思维才能解决的广泛的战略问题。<sup>[19]</sup>人工智能不可能完全具备人类的社会属性,不可能具备自觉、自主、自立的社会活动。<sup>[20]</sup>“心”本身就具有道德主体的特征,类似“变心”“黑心”“野心”等说法都是道德意义上的谴责。这种特征联系着人的社会属性,包括人格、人品、人性等等,都是人工智能无法模拟和取代的。当然,现代“用心”思维需要与“动脑”的协同,才能消除自身弱点,在科技发展、社会治理和日常生活中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

具体说来,当代社会治理中的“心”“脑”协同作用,应该弥补单纯强调规章制度、分析推理、量化评价的造成的局限性。因为规章制度不可能面面俱到,单靠分析推理很难形成宏

观认识,简单的量化评价容易忽略那些难以量化的因素。这就需要人们从“用心”的直观体验的角度,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全局意识的作用,体现爱心、事业心、责任心,弥补单纯“动脑”的不足。比如在面临新冠疫情防控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医护人员的奉献精神、广大民众的自觉配合、管理人员的尽职尽责,都不是完全靠规章条文驱动的,都展现了“用心”的作用。如果没有“用心”去体察、协调、相互关照,人们遇事就可能相互推卸责任,使人际关系变得冷漠,使集体缺乏凝聚力,使关系到大局的事情得不到有效治理。

当代日常生活中的“心”“脑”协同作用,能够弥补单纯强调个人权益、利害关系、特立独行意识造成的局限性。维护个人眼前权益不能以牺牲公众的长远利益为代价,这需要发挥“用心”思维的整体视角的作用,培养一种“大我”意识。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时权衡利弊固然必要,但利害关系之外还有亲情、友情、感恩、义务这些需要“用心”把握的因素。市场经济环境造就了青年一代更明显的特立独行意识,力求彰显个性,但需要通过“用心”的直观体验把握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关系、自由意志与必然趋势的关系。“心”“脑”协同作用有助于强化人们的道德敏感性,培养自律意识、环境意识和风险意识。

#### 四、“心”“脑”协同作用的若干展望

在经历了“心”“脑”概念不自觉混用的时期之后,“心”“脑”之辨可能带来二者关系的新样态,给人们带来新的思维体验。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探索和完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心”“脑”协同机制,使中国传统的“心”的智慧在新时代发扬光大。这里有几个领域值得特别关注。

其一,探索开展“心”“脑”协同作用的教育。现在很多学校里往往重视“动脑”的教育,强调掌握理论知识,了解各种公式、法则、工艺标准、解题方法,但缺乏对培养“用心”思维能力的自觉地重视和有效培育途径。“心”“脑”

协同互补的教育需要培养学生增强对现实生活的体验、适应和创造能力,培养学生形成“大我”观念和行为准则,增强社会责任感,主动协调人际关系,维护集体和国家利益以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还需要培养他们提升审美层次,学会理解美、欣赏美、创造美。这对于目前正在开展的“新工科”“新理科”“新文科”教育改革显然十分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古代关于“用心”认知机制和方法的很多论述,其知识形态很难直接搬到现代生活中来,必须经过一个创造性的转化过程,才能使现代受教育者充分理解并学会应用。这些知识的讲授如何“嵌入”现代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如何增强教育过程的体验性,使学生具备开阔的知识背景和深刻的洞察力,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何将“用心”的直观体验能力与“动脑”的理性思维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其二,探索实施“心”“脑”协同作用的管理。这就是要从心灵沟通的角度思考管理者和被管理对象的关系,与体制机制变革有机结合,创造性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使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不断得到维护。这种管理方式应该进一步影响社会文化形态和技术发展模式,从制度层面避免“用心”和“动脑”的疏离。通过培养人们“用心”审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模式,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心”“贴心”“将心比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展现其应有价值。“心”“脑”协同作用的管理还有助于在工程技术活动中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器物以及人的身心活动的和谐融入设计过程之中,体现顺应自然、“以‘道’驭‘术’”、防患于未然等思想原则,真正使设计“走心”而非仅仅“过脑”。

其三,探索推广“心”“脑”协同作用的评价。在评价社会治理成效和工作业绩上,现在一些部门和单位注重指标体系的考核,用数字说话,这样做固然必要,但有不足之处。有些隐蔽的或难以量化的因素,如个人的思想状况、素质、追求,一个群体的人际关系、凝聚力、发展潜力,都需要“用心”去体察和评价。有些人无

所用心、漫不经心以至丧失“用心”能力的现象可能是逐渐出现的,原初的“用心”能力和态度可能随着人们的社会环境、地位、利益关系和生活目标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心”“脑”协同作用的评价应该是一个持续的、长远的过程,培养发自内心的“大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心”“脑”协同作用的评价应该广泛应用于教育、管理、医疗、人才选拔、技术评估等相关领域。可以设想,当人们在未来的社会评价中逐渐适应将“心”“脑”相提并论的时候,人们“用心”的能力就会和“动脑”的本事叠加在一起,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这对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将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 [参考文献]

- [1] 中医大辞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74.
- [2] 托马斯·R·布莱克斯利.右脑与创造[M].傅世侠 夏佩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4-16.
- [3] 孟昭兰.人类情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43-145
- [4] 张岱年.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要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88-195.
- [5] 张载.张载集[M].章锡琛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376.
- [6] 盖尔·戈德温.心的简史[M].彭亦农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25-73.
- [7] 王前.“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9-211.
- [8] 刘正琰、高明凯.汉语外来语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355.
- [9] 申荷永.心理学与中国文化[N].光明日报,1997-03-01.
- [10] 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M].倪梁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73-488.
- [11] 安乐哲等.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M].何金俐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33.
- [12] 牛政凯、蔡成后.分析心理学在中国:发展历程及本土改造[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35-144
- [13] 植物人做伤残鉴定,被要求“本人亲自到场”[OL].北青网,https://t.yynet.cn/baijia/31615410.html.2021-10-22.
- [14] 王前.生机的意蕴——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49-180.
- [15] 宁晓萌.表达与存在——梅洛-庞蒂现象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6;177.
- [16] 徐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3-4.
- [17] 洪小文.计算机是最好的左脑[N].中国青年报,2016-11-15.
- [18] 徐英瑾.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8.
- [19] Davenport, T. H. 'Rise of the Strategy Machines'[J].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16, 58(1): 13-16.
- [20] Asaro, P. M. 'What Should We Want from a Robot Ethic?'[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Ethics*, 2006, 6(12): 9-16.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